

翻译教学法研究

李庆云 著

HEUP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翻译教学法研究

李庆云 著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近年来,我国外语翻译教学有了长足进展,外语翻译教学专家和学者取得丰富的成果。但纵观翻译教学研究,很多翻译教学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翻译技巧的讲授和练习,缺乏对整个翻译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本书以翻译史为研究起点,以我国外语翻译教学的形成和发展为切入点,从多种视角对翻译教学法及教学模式进行研究,为构建科学、系统的翻译教学法理论奠定一定基础。

本书主要面向外语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和有致力于此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教学法研究/李庆云著. —哈尔滨:哈尔滨
工程大学出版社,2015. 6
ISBN 978 - 7 - 5661 - 1074 - 9

I. ①翻… II. ①李… III. ①英语 - 翻译 - 教学
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7142 号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124 号
邮政编码 150001
发行电话 0451 - 82519328
传 真 0451 - 825196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4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http://www.hrbeupress.com>
E-mail: heupress@hrbeu.edu.cn

前言

自 21 世纪以来,翻译教学在我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许许多多辛勤地工作在外语教学第一线的翻译教学工作者,从多个角度对翻译教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纵观我国翻译教学,有批评法、比较法、翻译工作坊教学法、翻译语料库教学法、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法、翻译任务教学法、笔译推理教学法、翻译档案教学法、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启发式翻译教学法、题材式教学法等。这些翻译教学法分别从语法结构,篇章结构,文化、心理等差异为切入点,对翻译课堂教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纵观翻译教学研究,很多翻译教学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翻译技巧的讲授和练习,缺乏对整个翻译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为此,本书溯本求源,介绍了中外翻译发展史和我国的外语教学研究,使读者对翻译学科发展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其次,本书着重论述了翻译教学的研究视角和翻译课堂教学模式。在“翻译教学法研究的视角”一章中,分别从建构主义视角、跨文化交际视角、对比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的主体和客体进行了论述;在“翻译教学模式研究”一章中不仅仅探讨了以教师和学生为中心的翻译教学法,而且将多媒体翻译教学、网络翻译教学、翻译教学的语料语库等内容添加进去,使得本书紧扣翻译教学发展脉搏,尽量能够反映当前翻译教学法的发展状况。本书更加强调在翻译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比目的语与源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把母语同外语之间的相同方面作为基础和前提,把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同方面作为翻译教学工作的核心。换言之,翻译教学就是让学生初步地了解 and 懂得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两种语言之间在各个层面的转换。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从中外两种角度阐述了翻译史;第二章介绍了我国翻译教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三章论述了从多种视角对翻译教学法的研究;第四章是翻译教学模式研究;第五章为翻译教学法中几种关系的处理。本书以笔者多年翻译教学经验为基础,在不断地学习许多优秀的翻译教学工作者的宝贵经验基础上形成拙著。其主要目的是为翻译教学法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构建科学、系统的翻译教学法理论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向许多专家和同行虚心求教,得到了他们的无私帮助。在此一致表示感谢。

本书为黑龙江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地方高校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项目编号:JGXW-HLJ-2014134)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也是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外语教育在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JG2013010514)的结题成果之一。

著者

2015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史简介	1
第一节 西方翻译简史	1
第二节 中国翻译简史	5
第二章 我国翻译教学的形成与发展	10
第一节 萌芽时期	10
第二节 初步形成时期:西学引进过程中的外语教学	11
第三节 缓慢发展时期:建国前的外语教学	13
第四节 快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的翻译教学	17
第三章 翻译教学法研究的视角	19
第一节 建构主义视角	19
第二节 建构主义视角中的教师与学生的知识结构	31
第三节 建构主义视角中学生的能力培养	33
第四节 语言习得视角	37
第五节 跨文化交际视角	40
第六节 对比语言学视角	50
第四章 翻译教学模式研究	57
第一节 词汇翻译教学	57
第二节 段落翻译教学	103
第三节 语法翻译教学	121
第四节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138
第五节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翻译教学模式	141
第六节 网络环境下的翻译教学	144
第七节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语料语库对翻译教学影响	147
第五章 翻译教学法中几种关系的处理	150
第一节 思维与能力	150
第二节 教师与学生	154
第三节 知识与能力	158
第四节 测试与教学	167
参考文献	171

第一章 翻译史简介

据现有的文字记载,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历史已经长达两千余年。我国的翻译史,原始社会无文献可考,夏商时代虽略有文献,但现有史料也失之过简,无法考察当时的翻译活动。最早有记载的翻译史,应该从佛经翻译算起,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中西方的翻译历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方法,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

第一节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翻开了它的第一页。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3至2世纪之间,由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严格地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公元前3世纪问世,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是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西方翻译活动简介

纵观西方翻译活动,其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但一般来说,西方翻译活动则主要按照以下四个阶段来进行划分。

(一) 古代西方翻译

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已经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曾经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这些活动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于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到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希腊奴隶社会的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始于这一时期或始

于更早的时期。

西方的第二个翻译高潮,主要是宗教性质的,出现在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因此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4世纪这一译事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公元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上取得了垄断地位,《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又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所谓的“蛮族”建立了各自的国家,宗教翻译便占有了更大的市场,《圣经》被相继译成其各自的语言,有的译本甚至成为有关该民族语言的第一批文学材料。

(二) 中世纪西方翻译

中世纪中期,即11至12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史上出现了第三个高潮:西方翻译家们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早在9世纪和10世纪,叙利亚学者就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后来,在托莱多译成拉丁语的许多希腊典籍便是从这些阿拉伯文译本转译的。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非常深远。

(三)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

14至16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这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16世纪时,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此时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这项活动已经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古代和当代的许多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的语言,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家阿米欧先后用了十七年时间(1542—1559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佛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极其优秀的作品。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发展是以《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为标志的,该书出版于1611年,其特点是英语风格显著、语言地道、通俗和优美,并为此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长时期里一直是英国唯一一部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乃是

西方(主要是西欧)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终于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四)近现代西方翻译

文艺复兴后,西方各国的翻译虽然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就其规模 and 影响而言,已经远远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尽管如此仍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译著。这个时期翻译活动的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的和当代的作品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许多优秀译品也陆续问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各个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些给翻译事业繁荣兴旺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西方翻译进入了第六个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翻译活动。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特点是:

(1)翻译的范围比从前扩大了很多。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则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商业领域;

(2)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如今,翻译已经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不仅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而且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翻译任务;

(3)翻译的作用越来越大,是以往所不可企及的。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西方各国之间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密切,所有这些交际活动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翻译在其间起着越来越大的实际作用;

(4)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许多国家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如法国、瑞士、比利时设有翻译学校或学府,英、美、苏等国在大学高年级开设翻译班(Translation Workshop),以培养翻译人员;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国的译协;打破传统的翻译方式,开拓新的翻译模式,发展机器翻译。新时期翻译工作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规模也越来越壮大,形势日趋多样化。目前,机器翻译的研究如火如荼,自1946年英美学者首次讨论用计算机做翻译的可能性以来,翻译机器的研制和运用经过近七十年的曲折历程,已日益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它是对几千年来传统的手工翻译的挑战,也是翻译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二、西方译论简介

西方翻译史的另一个侧面是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在世界上进行了几千年,翻译理论也是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同其他的领域的活动一样,翻译并不依赖理论而存在,然而,翻译的实践总是引出理论并推动理论的进步,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早在古罗马时期,一些著名的作家、演说家已经论及翻译,以后各国又有人广为论述,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见解,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他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相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罗厘定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即:直译和意译,从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accuracy)与不准确(inaccuracy)的问题向前发展。

继西塞罗之后,西方翻译史上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在古代,除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的两分法外,还有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和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有奥古斯丁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在中世纪,有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有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伊拉斯谟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和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有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文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在17至19世纪,有巴托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有德莱顿的“直译”“意译”“拟作”的翻译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有泰特勒的优秀译作的标准和“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备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有施莱尔马赫的口译和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分;有洪堡的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有阿诺德的“翻译荷马必须正确把握住荷马特征”的观点。在20世纪,有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的观点;有雅克布逊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类别;有列维的“翻译应为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种作决定的过程”和加切奇拉泽的“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文艺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有弗斯、卡特弗德的翻译在于“语言环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有奈达的“等同的读者反应”和“翻译即交际”的理论。可以说,所有这些主要观点都是构成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另一个侧面说,西方翻译理论主要由两条不同的线构成。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线,这是一条最古老的线,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翻译家一直延伸到捷克的列维和苏联的加切奇拉泽等现代翻译理论家。按照这条线,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再创造。理论家们除不断讨论直译和意译、死译与活译的利弊外,对翻译的目的和效果也进行了分析。他们强调尊重译入语文化,讲究译文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一定的文学才华。另一条线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派,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它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上的对策。这两条线虽然有各自的特点,但都各有其偏颇之处。文艺学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目的和结果,从宏观上强调译文的艺术效果,不甚研究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使用技巧问题,也忽略非文艺作品的翻译和文艺作品翻译中的非创造功能。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缺陷是,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略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理论分析往往局限于单个的词、句子或语法现象,而忽略话语结构这一更为广泛的内容。直到最近十来年,随着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这种缺陷才开始修正。

从发展的趋势看,语言学翻译理论现已占据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理论家大都一致认为,翻译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应用语言学 and 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应用语言学 and 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与语义学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与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多种科学有关。必须看到,不论是文艺学翻译理论还是语言学翻译理论,它们都是相辅相成的。翻译既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创造性、文学性的,也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只是传递客观信息的。尤其重要的是,翻译理论的研究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以指导翻译实践,揭示翻译活动的客观的和内在的规律为其唯一的目的。否则,翻译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

第二节 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活动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至于翻译史的分期,似乎没有专门的讨论,个别学者提出过一些不同的说法。如周作人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六朝至唐朝时期佛经的翻译;二、清末时期《圣经》的翻译至《时务报》的时代;三、经严复、林纾过渡到新文学时期。裘柱常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唐以前的佛经翻译时期;二、清末传入西方文学、哲学、科学翻译时期。马祖毅则认为五四运动以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一、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三、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

本书综合众家之说,把中国的翻译史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符秦时期;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四、五四时期;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汉代—符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84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活动。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唯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声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 499—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享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我国的佛经翻译确凿可考应始自东汉桓帝时安世高译出的《明度五十校计经》。

二、隋—唐—宋时代

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但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不是很多。释彦琮是这个时期比较有名的翻译家,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23部100余卷。释彦琮在他撰写的《辩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做好佛经翻译的八个条

件:(1)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释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属于翻译者本身条件方面的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释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人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也有说法是义净)一起号称华夏四大译师。其中最突出的是鸠摩罗什、玄奘二人,而玄奘尤为杰出,其开创了我国译经史的新风格、新局面。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到长安。他带回佛经六百多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1335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续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11种:(1)译主,为全场主脑,主译人,精通梵文,深谙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2)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审查原文与译文意义,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出入,均由他和译主商讨;(3)证文,或称证梵本,于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如有及时指出;(4)度语,根据梵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5)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6)缀文,整理笔受的记录,使之符合汉语习惯;(7)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是否有误;(8)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9)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10)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直到朗朗上口为止;(11)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在翻译实践中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

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还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翻译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蒙汉两种文字的互译,二是其他文字的翻译。统治者曾下诏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三、明清时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几个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徐光启非常重视此书的翻译,译稿经过反复订证,一直沿用至今。清代的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清朝的科举考试,还特设翻译一科,此科分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两类。翻译考试设有童试、乡试、会试三种。清朝在中央一级特设了许多翻译机构。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是我国翻译史上明确提出翻译标准的人。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悖(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

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酒,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

四、五四时期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姿。”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引进国外新的文学作品表示方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无丝毫共同之处的。他们二人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受到了重视。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

第二章 我国翻译教学的形成与发展

语言是人类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媒介。不同种族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从而达到相互了解和相互沟通。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各民族不断交融的多民族国家。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相互之间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然而,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很多关于我国古代如何进行不同民族间的语言学习和教育无法考察。

第一节 萌芽时期

我国从秦汉以来,经唐宋到元代初年,一千四百余年,同外国的交往一直十分密切。当时对外语人才的需要是可想而知的。在我国,外语教学应该说是远在二千年前早已有之。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发现有关当时外语教学情况的史料。这点尚待史学界和外语教育界进一步查考。根据已经发现的史料,古代的正规外语教育应算作外国语文学校,可以把元朝的“回回国子学”定为我国最古老的外国语文学校。

根据以上资料,元代“回回国子学”确系专门传授回回文的学校。然而,元代为何专授回回文而并不教习其他语言文字呢?看来这主要是出于当时国际交流的需要。

元朝是我国以蒙古族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封建王朝,其疆域十分广阔,与各国特别是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西域各国来我国的人员随之增加,阿拉伯和波斯人带来了天文、历算、医学及天文仪器等。元朝统治者曾有意想把蒙古文作为国内各地和对外交往的主要交流文字,但碰了壁。国内大部分地区仍通用汉字,唯有部分地区才通行蒙古文字。

元代之后,教习外语的学校主要是明代的“四夷馆”。据《明史·职官制》载:“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但这八馆此时以语言文字为主,而不是以教学为主。到明代宣德元年才“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课程”(同上),开始招收学生并进行教学活动,这时才称得上是专门教习外语的学校。

明朝永乐年间,外语教学备受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郑和、侯显相继出国,需要一批译员;另一方面又因为出访后与各国交往增多,大批文书需要译写。因此,不但“四夷馆”中学习成绩优良者即可委以官职,连民间精通外文的人也可被荐举外用,以补译员之不足。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明代“四夷馆”的规模并不小,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

外,还有印度、缅甸、暹罗等国语言;官生人数也不少,仅马铭一人就教授一百五十四人。二是国际交往的需要推动了当时外语教学的发展,因此不论是官学的还是私学的,只要精通外语,朝廷一般都量才录用。

明代之后,清政府开设俄罗斯文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俄语学校。它究竟建立于何年,至今说法不一。

据资料记载俄罗斯文馆是一所主要通过学习俄语升官任职的学校。每五年考试一次,成绩分为三等:一等者授七品官,七品官复考一等者授为主事,成为有实权的官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者留馆继续学习,从中择优留作助教。这一记载说明,俄罗斯文馆并非单纯地培养人员,它的目的是为了清政府培养同俄国政府办理外交事宜和商务的官员。

俄罗斯文馆初办时在教学上主要依靠俄国人和定居中国的俄罗斯人,后来陆续增加了一些中国教员,从此教学由中外人士合作,至于行政和管理事务则均由中国人主事。由于它带有考试任职的性质,因此对考试的要求也比较严格,设月考、季考和岁考。考试成绩低劣即被淘汰或留馆继续学习。

俄罗斯文馆经办达一百五十四年之久。它初创于1708年,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请,它结束了单一语种的教学,开始增设其他外国语文。后于1862年并入新创立的外国语文学校——京师同文馆。

第二节 初步形成时期:西学引进过程中的外语教学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八十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教育侵略,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也跟着发生剧烈的变化。首先有清末地主官僚在推行洋务运动中的“新教育”措施,继而有改良主义维新运动中抄袭日本教育制度的“壬寅、癸卯学制”,辛亥革命后又有“壬子、癸丑学制”。这些学制都带有浓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

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向来夜郎自大。自诩“天朝文明”,非“夷狄之邦”所能比拟,奉行闭关自守,采用盲目的排外政策。鸦片战争后,清廷衰败之象暴露无遗。除顽固派外,众多朝野人士认为,唯有了解和学习“西洋”文明,谋求振兴,才能巩固清廷统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外语教育才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首先,创办了几所外国语文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借以加强对列强的交涉。接着又开办各类理工科技学校,并把外语列为主课,让学生运用外语这个工具去学习西洋“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品尚象之术、治军之法”,以求振兴。此后,又废科举,办学堂,广设外语课,借以培养“博通时务”“具备艺能”的“通材”。为了免致“永远仰给外国教师”,外语师资的培养工作也开始得到重视。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创办的新式学校大多是外国语文学校。最早的新式学校是

1862 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接着有 1863 年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 年开办的广州广方言馆。稍后,又有湖北自强学堂、湘乡东山精舍方言斋和京师译学馆等。

这些近代的外国语学校,大多设有英、俄、德、法、日语等科目;除教习主课外语外,还授以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和史地知识,目的是要学生读“西书”、译“西学”、学“西洋”。因为西洋书籍“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致精微”。

1862 年同文馆开办时仅设英文馆,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第一任英文教习,中国教师徐树琳教授汉文。1863 年 3 月,法文馆和俄文馆相继成立。法文教习是司默灵,俄文教习由俄国使馆波波夫兼任。1867 年,增设算学馆,传授天文、算学、理化。1872 年,添设德文馆,教习是第图晋。1896 年,又设东文馆,杉几太郎任日文教习。和英文馆一样,各馆均配一位中国教师教习汉文,另外配备提调与助教数人,专管学馆其他事物。

同文馆在办校初期并没有配备总辖校务的人员。1863 年,美国传教士丁匙良来同文馆教习英文。1869 年,清政府任命他为总教习。这样,他就成了该馆的第一任校长。丁匙良在职达二十六年之久,直至 1895 年才由该馆物理教习欧礼斐接任。

同文馆各馆的学生起初均为十名。自光绪十三年(1887 年)起直到 1900 年该馆停办时,学生总额一直维持在一百二十名左右。

同文馆对学生的选择比较严格,相当于满族贵族学校的招生标准。最初只收十三四岁的满族学生,学制三年,主要学习外文和汉文。后来发现,学生程度太低,连学习汉文也颇有困难,于是扩大招收汉族学生,年龄也放宽到二十岁。学制改为八年,加强中外文教学,增设自然科学和史地等课程。学生一律住宿,除膳食、书籍、纸笔皆由学馆供给外,每月每人另支薪水银十两。同文馆对学生管理也很严格,凡学习纪律、作息时间、考核奖惩、请示报告、文书档案管理等等,均订立了制度,学生不得违反。

同文馆创办于 1862 年,1900 年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而被迫停办,于 1901 年底并入京师大学堂。办学时间历四十年之久。1863 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以上海交涉事件较多为理由,经清政府批准,仿京师同文馆例,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遴选上海邻近地区十四岁以下的俊秀儿童入学。该馆不像京师同文馆那样只利用礼拜休业日学习汉文,而是将经史小学列为正课。学生亦以外国语文为主课,兼习史地与自然科学,三年后毕业,分派到各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充任官承办洋务。1905 年,该馆改为兵工中学堂,成为五年制的中等工业学堂。1864 年,广州仿上海方言馆例,亦设广方言馆,又称“广州同文馆”。该馆主要为培养八旗子弟人才而设,学生不过数十名,每十人中以旗籍八人、民籍二人为准。当时只授英文,兼授浅近的算学。1905 年,改名为广州译学馆,成为五年制的高等学堂。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于 1903 年改为大学堂的译学馆不久,译学馆又改由学部大臣等辖而不隶属于大学堂。

同治三年(1864 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借助外国武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看到西洋兵船火器、科学技术很有威力,于是奏请政府批准,先后兴办造船、军